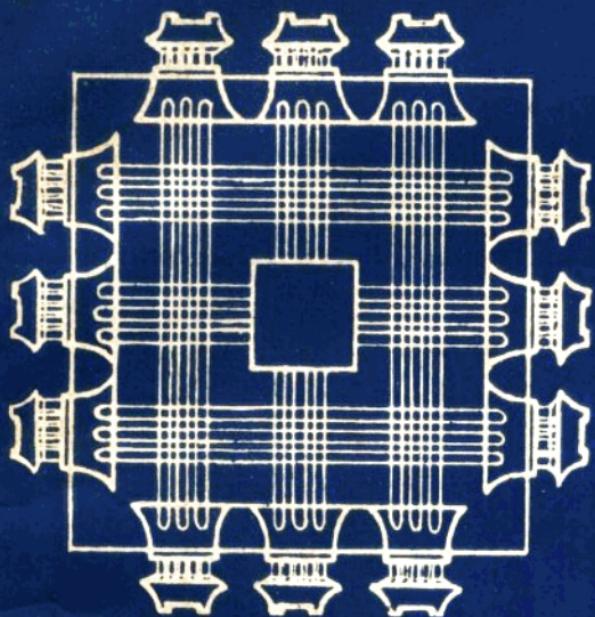


河南省城建史志稿

选编
第四辑

河南省建设厅城建志编辑室



前　　言

《河南省城建史志稿选编》主要是选登经过审改又未最后定稿的河南省城市建设方面的史志稿成果，以便进一步听取行家修订意见；其次是把搜集到的不能入志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有关资料，收编起来，以资借鉴；其三是交流城建史志编写经验。

河南地处中原，乃华夏民族始筑城郭之地（《世本》载“鲧作城郭”。“鲧作城，鲧作郭”。即在今登封县告成乡境内）。到东汉末年，在河南大地上已形成都城、郡府、县城和集镇的四级城镇网络。千百年来，中原大地历尽战火与自然灾害，河南城镇几经兴衰，但城市规划建设情况鲜有记载。几年来，我们查阅，收集了不少资

料。但系统性、详实性仍感不足。衷心欢迎广大城建工作者、行家，提供资料，将所撰稿件寄河南省城建志编辑室。

此“选编”，属征求意见性质，仅供参考，请勿引用。

1987年8月28日

目 录

〔城镇探源〕

简论河南城镇建设的历史发展……………李 形（ 1 ）

〔史志稿选〕之四

《当代中国的河南》第六编 当代河南的城镇建设（初稿）

第一章 河南城镇发展的概述	（ 24 ）
第一节 建国前河南城镇的发展	（ 24 ）
第二节 恢复时期河南的城市建设	（ 25 ）
第三节 “一五”时期河南的城市建设	（ 28 ）
第四节 “二五”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城市建设	（ 31 ）
第五节 “文革”时期的城市建设	（ 32 ）
第六节 河南城市建设的新时期	（ 35 ）
第二章 河南的主要城市建设	（ 39 ）
第一节 交通枢纽 河南省会——郑州市	（ 39 ）
第二节 九朝古都 工业新城——洛阳市	（ 51 ）
第三节 能源基地 中州煤城——平顶山市	（ 69 ）
第四节 七朝古都 历史名城——开封市	（ 81 ）
第五节 平原故府 工业新城——新乡市	（ 91 ）
第六节 殷墟故地 钢铁基地——安阳市	（ 99 ）
第七节 石油基地 化工新城——濮阳市	（ 109 ）
第八节 古老煤都 开拓前进——焦作市	（ 116 ）
第九节 其它城市的建设	（ 127 ）
第三章 河南城市建设的规划、管理和基础设施	（ 137 ）
第一节 城市规划与管理	（ 137 ）

第二节	城市房地产和住宅建设	(144)
第三节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152)
第四节	城市环境保护	(161)
第四章	建设中的河南城镇网络	(168)
第一节	中心城市骨干作用的发挥	(168)
第二节	蓬勃兴起的乡镇建设	(179)
第五章	河南建筑业的发展	(193)
第一节	建筑队伍的发展历程	(193)
第二节	建筑队伍的技术素质全面提高	(197)
第三节	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	(203)
〔当代测绘和地名〕		
河南测绘事业的发展		李守仁 芦宝珠 唐亚美 (209)
河南的地名工作在前进		陈文斌 (223)
〔修志经验〕		
城市建设志编修浅谈		贾云台 张书萍 (229)

简论河南城镇建设的历史发展

李 形

河南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城镇的形成很早。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河南的城镇在数量上、规模上以及规划布局和建筑艺术上，都曾达到很高的水平。

一、夏代以前河南奴隶制城邑的诞生

河南城镇诞生于何时，前人考证较少，分析大量的古籍文献和考古资料得知，基本上不会晚于夏代初期，至今已有四千年左右的历史。我国史书中记载有许多古代夏族造城的传说，如《世本·作篇》中讲道：“鲧造城郭”，《吕氏春秋》中指出：“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淮南子》中也说：“昔者鲧作三仞之城”。鲧是夏部族进入阶级社会前夕著名的部落酋长，因治水无成，被杀于禹渊。禹是鲧的儿子，是我国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国家的第一个“国王”。传说鲧作城，反映了夏族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历史转折。当时正处于人类第一次社会劳动大分工时期，由于农业的出现而形成了固定居民点，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私有制，进而产生了阶级，阶级的产生和人类社会的分工出现了国家。统治阶级为保护其利益，筑起了城堡，这就是最初城郭的出现。在进入阶级社会前后，夏部族的活动中心是在今河南嵩山周围的伊、颍、汝等河谷平地以及晋南的汾河谷地一带。因此，如果夏族创建城郭的传说可靠，则河南城邑的形成，就应是在夏代立国之初。

特别重要的是，1977年在登封县告成镇西，颍水和五渡河交汇处的王城岗上，发掘出东西并列的两个小型城堡的夯土墙基，经对出土的土木炭测定，其年代约距今4400年左右。1979年，在传说中“太昊之墟”淮阳县东南四公里处的平粮台城遗址的发掘，表明是用小板筑堆法建筑的城堡，面积为34000多平方米，并有门卫房、排水管道的敷设（发掘陶制排水管道五米多），对出土物的土木炭测定，距今有4500年左右。上述两者的年代，均相当或稍早于夏代开国的年代，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两处古城遗址。王城岗古城的位置正好在史书记载的“禹都阳城”附近，目前虽不能断定它是夏代早期的都城，但据此可以肯定在距今四千多年的夏初，河南已经出现了城镇。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当时的城镇还只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规模很小，其职能主要是作为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城邑的分布，集中在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河南西北部；《古本竹书纪年》所载夏代六次迁都，全在这一地区。除前面提到的阳城外，其余五个都城是：斟𬩽（今巩县西南）、帝丘（今濮阳西南）、原（今济源西北）、老丘（今开封县陈留北）、西河（今安阳东南）。其他方国和部族的首邑，如斟灌、葛、亳、虞、商等也多分布在河南西北部。

二、商、周时期河南奴隶制城镇的成长

公元前十六世纪，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灭夏而有天下，其势力范围扩大为：东至海洋、西达陕西中部、北到内蒙、南抵江淮以南，而河南仍是它活动的主要中心。据史书所载，商建国后，曾有七次迁都，其中有五个都城建于河南的中西北部，即𢙈（亦作嚣，今郑州）、西亳（偃师）、相（今内黄东南）、邢（亦叫耿，今温县东）和殷（今安阳市西）。正因建都于殷，后人又称商为殷商。除都城外，已知的商朝统治范围内的七十多个

城邑中有近三十个分布在河南，如沫（亦作妹，今淇县境）、牧（今汲县）、韦（今滑县）、封父（今封丘）、鸣条（今封丘东）、历（今禹县）、洛（今洛阳东）、阙巩（今巩县）、夹（今陕县）、杞（今杞县）、霍（今临汝）、蔡（今上蔡）等。这说明河南是当时全国城邑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商代是我国奴隶社会大发展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劳动分工的加深，以及奴隶制国家统治力量的增强，河南的城邑建设较夏代有很大的发展，其表现为：

（一）城邑的工商业得到发展。这从解放后，在偃师二里头和郑州市区发掘的两处商代文化遗址，以及解放前在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以得到证明。据土木炭测定，这三处古城遗址距今均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在发掘中不仅都发现有规模很大的宫殿遗迹，说明是当时的都城；而且都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玉器、骨器、石器等文物，发现有手工业作坊遗址；在出土的大批文物中，还发现有原产于南海和东海的鲸骨、鲟鱼骨、海龟壳、海贝、海螺和原产于大西北的绿松石等，其中有的可能是当时的商品或贡品，有的可能是当时的货币。这说明商代城市的商业，已相当发达了。

（二）城邑的规模有所扩大，并出现城市规划萌芽。从1955年发掘的郑州商代古城遗址可以看到，其面积达二十五平方公里，约相当于现在郑州市区面积的四分之一。在这一遗址的中部，即现郑州旧市区的中心和老城北关一带，还发现一座面积较大的商代城垣遗址，选址适中、布局完整，已有规划的痕迹，俨然帝都景况。该城位于古黄河平原西端，座落在金水河与熊耳河之间。城市布置以坚实的城墙为标志，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基本上呈长方形，周长约七公里，面积约三点四平方公里，比现在的郑州老城约大三分之一强，若按每平方公里居住二千人计，则城市人口规模约为五万人以上，这在当时世界上也算得上

最大城市之一。外城主要是奴隶和平民居住的地方，并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城邑的附近还有墓葬地。这种布局的特点，反映了我国奴隶社会城邑的基本性质，既是奴隶主贵族聚居的地方，也是政治、军事中心。

但是，商代河南的生产力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境内尚有很多地区，尤其是西部和南部山地及东部的低湿地带，没有完全开发。所以总的来讲，当时城邑数量仍较少，而且除都城外，一般城邑的规模也很小。

周灭商建立我国第三个王朝后，情况就不同了。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也是河南奴隶制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当时河南除部分山区和低湿地区以外，广大的平原及河谷、盆地，大部分已陆续得到开发，生产水平较夏、商时代有很大提高。西周虽发祥于渭河流域，建都于镐京（今西安市西），但由于河南地处中原，居全国的中心位置，境内经济得以进一步开发，其奴隶制城邑也进入了全盛时期。

首先得到发展的是洛阳。周王朝建国后，因成王年幼，周公姬旦曾东征平定商武庚叛乱，后深感国都镐京位置偏西，不易控制东方，对商朝“顽民”也不放心，并想实现武王在洛阳建都的遗愿。故而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周公就奏请成王姬诵，去洛筑新城。成王同意，于周成王七年二月（公元前约1020年），派太保召公姬奭到洛阳选择筑城地址，作出城郭规划。三月周公姬旦来洛阳，组织各诸侯和商朝被俘的官兵贵族，按照召公的规划，营造洛邑，称为成周（镐京称宗周）。洛邑建二城：一个在今老城西，谓之王城，作为统治东方的政治据点；另一个在今洛阳东部白马寺以东，称下都，“迁殷顽民居之”，并派重兵驻守，作为监督东方的战略基地。从此，洛阳就成为西周时期仅次于镐京的政治、军事中心，实际上已成为西周的第二都城，也是当时河南最大的城市。西周亡后，周平王（公元前770年）迁都

洛邑，史称东周（初居王城、后迁下都），洛阳便成了全国的首都。

东周定都洛阳，有其重要原因，主要与洛阳在全国的战略位置和地理环境有关。据后来的《管子·乘马篇》中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说明建立都城要选择适当的地方。从经济而言，洛阳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并有洛、伊、涧、瀍四水贯流，水源充足，农业生产发展很早；就交通来说，洛阳西通关中、东达齐鲁、北去燕赵、南至湘楚、东南抵吴越，均很方便，故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之称；再就战略地位来看，“洛阳居天下之中，山河四塞”，“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河响洛、其固足恃”，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因为洛阳具备这些建设城市的有利条件，所以，不仅东周建都于此，而且以后的东汉、曹魏、晋、北魏、隋、唐、后梁和后唐等封建王朝均建都于此，前后共计934年，号称“九朝古都”。其建都时间之长，在我国六大古都中，仅次于西安。

关于周王城的位置与规模，史书鲜有记载，据新中国建国后考古发掘，位置在今洛阳王城公园周围而比公园现址大，王城的城垣大体呈长方形。据晋《元康地道记》记载：“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1954年考古实测，北城墙长2,890公尺，估计全城周长约15公里，面积比今洛阳老城大两倍多。城内建筑布局，有一定的规划制度，这种都邑布局来源于井田制的耕作方式。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建筑师建设城市），方九里（城四边每边长九里），旁三门（城郭四面各有三门）。其中每门都有三道，构成南北交织的方格状街道网，道宽20步，规定男子走右边，女子走左边，车辆行中间。王宫位居城中央，其左边为宗庙祖堂，右边为社稷神坛，前边为群臣诸侯朝会的殿厅，后边为商品交易的市场，各种建筑壮丽宽敞。这充分

体现了我国奴隶社会都城建设的基本特点，即所谓“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和“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常规礼制。

王城作为东周的都城共计251年，大体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到公元前519年，周敬王迫于王室之乱，把首都从王城迁到成周（即下都）。王城在战国时代至秦汉之际，均曾迭加修葺，在西汉以后，才逐渐荒芜，并在王城都城内另筑小城，为河南县城。在北魏以前，旧城即被废弃，至隋建都洛阳以后十三年，城墙被彻底平毁、一代巍峨宫城，从此泯灭。

除洛阳以外，各诸侯国的都城也有一定发展。西周实行分封制，先后分封的诸侯国大大小小有一千二百多个，经过互相兼并，到西周末期，尚有一百四十多个，其中在河南境内的就有五十多个，分布遍及全省广大地区。这些大小诸侯国各据一方发展实力，对当时河南经济的开发和城镇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它们的都城，像管国的管城（今郑州）、许国的许（今许昌市东）、宋国的商丘（今商丘县城南）、卫国的沫（今淇县）、蔡国的蔡（今上蔡）、陈国的陈（今淮阳）和郢（今汤阴东）、庸（今新乡西南）、东（今濮阳南）、共（今辉县）、温（今温县西）、杞（今杞县）、息（今息县西）、黄（今潢川西北）、申（今南阳市北）、蓼（今唐河县湖阳镇）、焦（今三门峡西）、北虢（今三门峡东）、东虢（今荥阳北）等，都是当时河南的主要城市。

由于诸侯城邑的普遍发展，使河南城邑分布的地域显著扩大。到了西周，除西部深山区以外，省内其它广大地区，都出现了城邑。但是由于分封割据制的强化，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地域性的约束，加上当时城堡建筑的规模，还受到诸侯等级地位的限制，所谓“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国三之一（意是诸侯的都城，大的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春秋·左传》鲁隐公元年），因此在西周时期，河南奴隶制城邑虽处全盛阶

段，但其规模并不大，城内的工商业也没有很大的发展。从城邑类型看，主要是一些政治、军事、经济三位一体的都城和诸侯首邑发展较多。

三、春秋战国时期河南城邑由奴隶制向封建城镇的过渡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也是河南城镇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城镇的时期。当时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铁制工具的使用，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加速了社会的转化，在社会转化过程中，交通运输条件有所改变，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河南城镇的发展。陆路交通以东周都城洛阳为中心，与各诸侯国的首邑都有大道相通；水路交通也是四通八达：向西有黄河通向关中，向东有丹、睢、颍、淮等河通向江、浙，黄河、济河，北通冀、鲁，南有唐、白等河道，通往楚、湘。尤其是战国初期（公元前361年），魏国疏通了鸿沟（运河），把当时河、淮之间的重要水道如济、兗、睢、澨、涡、沙、以及颍、汝等水道连接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原水道运输网，河南更跃居全国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镇发展也远远超过了西周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城镇数量剧增。我国古书中有许多关于河南城邑的记载：如《史记》称：穰侯为秦攻魏，“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余”；“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拔我城大小六十一”。这些讲的都是河南部分地区的城市，可见当时河南城镇数量之多，密度之大。根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全省大小城邑约计有二百多个，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互相吞并，城邑数量相对有所减少，然也在一百五十个以上。当然这些“城”，有的可能只是军事据点，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由政治、军事要塞发展为城邑了。

其次是城镇经济作用显著加强。早期的城邑，一般都是统治者居住的城堡，城中的手工业作坊直接被奴隶主贵族所掌握，那时的所谓“前朝后市”的“后市”，只不过是“日中为市”的市，市场在贵族居住的城堡后面，市罢即散。真正在经济生活中起作用的城市，是在春秋时期才出现的。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在交通汇集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占有相当地位的大城市，并出现不少巨商大贾如陶朱公、吕不韦、弦高等人。各国的都城所在地，尤为繁荣，如，魏都大梁（今开封）、卫都濮阳（今濮阳南）、楚都陈（今淮阳）、韩都阳翟（今禹县）以及东周都城洛阳，均是“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其它还有楚国的宛（今南阳市）、棠溪（今西平县西北），是全国著名的治铁中心；魏国的朝歌（今淇县）是北方贸易中心之一，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商丘是有名的手工业中心，居住着金、革、木、漆、车等各种工匠，被称之为“百工居肆”的都市；西周时还是一片荒芜之地的新郑，因地处当时“天下之中心”，当各国使节往来和商贾贸易的孔道，到春秋之时，手工业和商业也都特别繁荣。

其三是城镇规模显著扩大，都邑规划有所发展。西周时期的城邑，一般是诸侯的国都，方园不过九百丈，卿大夫的都城最大三百丈，小的才一百丈。一般邑中居民最多是一千家上下，普通是一百家，最少的才十家。春秋以后，随着周天子礼乐的崩溃，国君已经没有力量控制诸侯，各诸侯国都力图扩充自己的势力，称霸于世，所以扩大城镇规模，用天人感应思想来规划都邑，已成为所急需，这方面见于史书的有《吴越春秋》记载的吴国的阖闾城和越国的会稽城规划。到了战国时代，已出现了不少“千丈之城，万家之邑”。除东周都城洛阳以外，魏都大梁也是当时河南最大的城市，其规模比现在的开封老城还要大一些，方园超过十公里，人口不下二十万。又如宋都睢阳、韩都阳翟、楚都陈等，

城垣范围都超过五公里，人口均在十万以上。另据《国策一·周策》记载：韩之县城宜阳，也是“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从上述数例可看出，战国时期，河南城镇的规模已大大超过了前期。

战国后期，河南城镇的性质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国都和封君驻地，如中牟（今鹤壁西）、濮阳（今濮阳南）、野王（今沁阳）、大梁、阳翟、巩（今巩县西）、郑（今新郑），睢阳、阳城（登封东）和陈、穰（今邓县境）等。这类城市，经过长期战争吞并，已为数不多，但它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中心。此类城镇周围均有坚实的城墙，城内有贵族的宫殿和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和贸易场所，工商业都比较发达；城镇人口较多，规模较大，是新兴的封建城镇的代表。另一种是工商业性质的城镇，如宛、管、郾、焦、织、温、原以及宜阳、卢氏、棠溪等。这些城镇原来也多为诸侯国的都城或部落首邑，后因遭到吞并而降为一般城邑，其中有些仍是在一定地区的政治中心，但就其职能来讲，城镇的经济作用已显得更为重要了。第三种是军事城堡，如孟门（今辉县西）、函谷关（今灵宝境）、辕辕关（今登封西北）、鲁关（今鲁山南）和黾寨（今信阳南）等，它们中有的也具有交通贸易的作用。以上各种城镇之间有水道或陆路联系，共同构成了河南封建城镇网的雏型。

四、秦汉至北宋时期封建城市在河南的发展

从秦汉到北宋（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127年）这一千三百多年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也是河南历史上城市大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是波浪形的，尽管有时国家出现分裂混战的局面，使城市遭受过严重破坏，但坏而迅即修复，今胜于昔，保持着大发展的趋势。

1、秦汉时期河南封建城镇的大发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

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开创了秦汉两代历史四百四十年的统一局面。政治上的统一，消除了区域间的交通阻碍，从而大大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河南地处中原，交通发达，商贾云集，城市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西汉除京都长安外，全国有十八个大城市，在河南的就有七个，即雒阳（洛阳）、宛（南阳）、温（今温县西）、轵（今济源南）、阳翟（今禹县）、睢阳（商丘）和陈（淮阳）。《汉·桓宽·盐铁通有篇》中所列终汉之世“富冠海内”的名都有九个，在河南的就有六个，即温、轵、荥阳、宛邱（陈）、阳翟，三川（洛阳）。西汉末年，全国有五个人口在二十万以上的城市，河南就占两个，即洛阳和宛。

洛阳是东周故都，中原交通枢纽，西汉时就是仅次于京城长安的大都市，至东汉定都洛阳（改名雒阳），遂完全取代了长安的地位，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据考古发掘证明，东汉的洛阳城在今城东17公里的白马寺东，即周下都附近，城周长约十三公里，城外谷水环绕，城内规划格局严整，宫殿壮丽辉煌，工商业都很发达。《史记·货殖列传》称东汉雒阳的商业盛况是：“东贾齐鲁，南贾梁楚”，“船车贾贩，周放四方。库居积贮，满于都城。琦珞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足见其殷实繁荣。公元68年，在城西修建了我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宛是秦汉南阳郡所在地，是关中、江汉与中原之间交通往来的要冲，秦汉之前，就已成为豫西南的交通、军事重镇；西汉时期，工商业更加繁荣，是当时除长安外全国五大豪华都会（雒阳、邯郸、临淄、成都、宛）之一；东汉时尊为南都，曾在此设五均官，置交易丞和钱府丞，专管贸易等事宜，可见当时商业之盛况。宛最盛时，人口曾达47500户，（每户按5口人计，近24万人），规模之大，可与长安相比。

东汉末年，河南的城市除雒阳和宛等著名城市外，还有濮阳（今濮阳南）、陈留、许县（今许昌东）、新蔡、新野等，商业都相当兴盛；林虑（今林县）和西平（今舞阳东南）则是当时河南重要冶铁中心。

秦汉实行郡县制，县城普遍得到发展。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小诸侯国首邑，至秦汉时大多改为郡治所在。至东汉末年，河南境内除京都雒阳以外，仅郡县级的城市就有一百五十多个。在郡县之下，还有许多小城邑，如管城（今郑州）、原乡（今济源北）、邺城（今汤阴东南）、闵乡（今灵宝西）、纶城（今虞城境）、三户亭（今淅川西）、陆浑关（今伊川境）等，都是当时一定地区交通与贸易的中心。

秦汉时期城市的规划布局，在古之井田法、天人感应思想的基础上，又掺合了阴阳五行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因而当时的都邑规划是在徘徊中前进，在探索中发展，秦灭六国后的踌躇满志，骄奢淫逸也反映到了都邑规划上。从史书记载中可看到，秦始皇在咸阳大造宫室，连同周围地区的关中和关中以外，共建宫室七百余所。造这些宫室的规划思想，是以法天象地，遵从天意为基础的。《史记》上有记载说：“焉作信宫谓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唐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描绘了阿房宫的穷极华丽和雄伟壮观。洛阳、汉魏故城的发掘，更证明当时封建统治者规划、建设城市富丽堂皇和巍峨壮观的场面。汉魏故城是洛阳的第二座历史名城，它位于今洛阳市东十七公里洛（阳）、孟（津）、偃（师）交界处，北依邙山，南临洛水，地形北高南低，是在原成周城的旧址上，扩大城池而发展起来的。秦属三川郡，为秦十万户侯吕不韦的封邑所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诸朝，先后在此建都达五百零七年。东汉在城内广修宫殿和观台馆阁；公元26年起太庙，建社稷，立郊兆于城南，公元38年，起南宫前殿；公元56年建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次年，

立北郊，祀后土，至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修北宫及诸官府，城内修建濯龙园，芳林园及修明苑等庭园，在城外还建有三个市场。汉都雒阳城经二十余年的修建，城市面积约达十一平方公里，规模宏伟壮观，宫阙建筑富丽。

2、汉末至南北朝（公元220年至581年）河南城镇的曲折发展。东汉以后至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在这三百六十多年间，全国交通、商业长期陷于割裂隔绝状态；中原地区战祸频繁，经济、文化蒙受巨大损失，城市遭到严重破坏。河南因位于中原，每次战乱都是主要战场，城市受到破坏尤为严重。特别是洛阳，因地处战略要塞，又是当时全国主要的政治中心，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重点，受害更烈。据历史记载：在这期间，洛阳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有三次：第一次是东汉末年（公元190年），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驱洛阳百姓数百万西行，并火烧洛阳及周围数百里内的房屋，使千年皇都，化为废墟；第二次是西晋以后，经“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的混战，洛阳城市再次遭到彻底破坏，“城阙萧条，野无烟火”的荒残景象达数十年；第三次是东魏天元年（公元534年），高欢挟魏帝迁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发洛阳四十万户北迁，次年又发十万民夫尽拆洛阳宫殿，把建筑木材也运到邺，加上连年战乱，复使洛阳宫城尽毁，陷于荒芜七十年。

其它城镇的遭遇与洛阳大同小异。秦汉时河南著名的几个大城市，如宛、陈、温、轵、阳翟和雒阳等，经过多次战乱之后，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繁荣。不过，由于当时河南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每当动乱之后出现暂时平定的局面时，统治者总是要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恢复。如洛阳第二次破坏之后，出现了北魏统一北方的形势。公元495年，魏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重加修建，宫殿花园较魏晋有所发展。在城中